

1900年前后德语文学中的“羞耻的人” ——以施尼茨勒为例

杜娜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摘要: 自从亚当与夏娃偷食智慧果并睁开洞晓善恶与知识的眼睛之后,羞耻便进入人类世界,成为人特有的情感类型。本文采用文化化学的研究方法,锁定关键词“羞耻”以探讨1900年前后羞耻与人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梳理其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具体形态、机制、演变与功能。在此基础上,以阿图尔·施尼茨勒的两部文学文本为例,研究文学在关于羞耻的话语体系中承担何种角色、发出何种声响以及如何预见并演绎羞耻这一人类情感方式。

关键词: 羞耻; 世纪之交; 施尼茨勒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5)06-0161-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5.06.032

The Shame Discourse in German Literature around the Year of 1900

——On the Example of Two Literary Texts of Arthur Schnitzler

Du Na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Immediately after Adam and Eva had eaten the fruit of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their eyes were opened, and they suddenly felt ashamed of their nakedness. Since then, “shame” has crept into the human world, and has become a unique emotion of human beings. This essay,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culture study and centering on the keyword “shame”, discuss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des of human beings around the year of 1900, and further elucidates its forms, mechanisms, involvement and functions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Based on that, two literary texts of Arthur Schnitzler are referred to as examples, in an effort to examine what kind of roles literature plays in shame discourse, to what extent it exerts influence on the exposition of shame, and how it predicts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 human emotion.

Key words: shame; turn of the century; Arthur Schnitzler

1 认知范式的转换与羞耻理论的流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欧洲文化遭遇一场难以言喻的动荡和颠簸,传统的自然科学在与以宗教和哲学为首的人文学科的对角中,尽管仍牢牢掌控真理话语权,但却面临新学科和新视角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传统的物理学时空观,摧毁自然科学引以为本的稳固真理(Feste Wahrheiten)观;而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在1900年前后创立的感觉经验论将感觉置于科学认识的起点(唯一源泉)和终点(最后检验),并把科学认识的对象也归到感觉世界中。其次,生理学对人体机能的揭示、心理学的机构化以及心理分析法关于癔病的探究都为人对自身的认识打开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视角。生物学始于有生命的自然哲学,最

终归于细胞学,并认可“性”在生命留存繁衍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新生物学破天荒地将之前隐于暗处的身体,包括性,放到人类学研究的中心。这意味着前一种旨在探讨人类灵魂与动物性的人类学范式已开始分崩离析。身体和性在人类认知领域的复归与同时期关乎羞耻的讨论有十分微妙的关联。事实上,虽然羞耻在人类生活中从未退场,但因其自我遮蔽的方式与特性,加之其在罪感衬托下显得蒙昧粗鄙,所以关于羞耻的讨论或者与禁忌挂钩,讳莫如深,或者被归为与性相关的负面情感体验,以逆向体现向善的德行存在于片断和箴言里。

对羞耻的结构与根本成因的系统分析始于达尔文。他在1848年发表的《人类与动物的表情》一书中单列一章,将因羞耻诱发的脸红定义为所有情绪表达中最具人

类特性的一种,再将其根本成因归结为人“自觉被他人所关注”(达尔文 2009: 204-225)。这样,羞耻就被定义为与人类生存方式密切相关,也是人所特有的情感方式,而对羞耻的解读与分析也被从性、伦理道德领域剥离出来,其重心被移到关涉人的个体体验和“自我”(das Selbst)中。20世纪初,以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和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为先驱和代表的哲学人类学研究者拓宽并加深对人生存方式的理解,着力探讨人所具有的区别于动、植物的本质问题以及人形而上学的特殊地位问题。在此框架内,舍勒将羞耻定义为一种为人所特有的并与人类生存方式休戚相关的情感模式,将羞耻提升为人类价值谱系中的重要成分。人“拥有身体”,同时又是“这具身体”,肉身性不可回避,而人在精神上对此种肉身性的自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也让人成为不得不羞耻的存在。如舍勒所言,意义和对精神的要求与肉身的贫乏之间不可调和的不和谐音是羞耻感形成的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肉身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人才有了不得不耻的条件;同时,正是因为人同时还有着自己不依赖于肉身的、作为精神性的人的自觉,方才有了感觉到耻的可能性。”(Scheler 2000: 69)

总之,当人的动物性与身体性从宗教伦理与知识理性的双重压制中逃脱,重新进入人类视野,并成为人对自我理解与设想的重要维度时,羞耻也获得不同于以往的关注与理解。我不敢说这二者之间有何逻辑因果联系,但二者之间的确是平行发生,彼此映照:重重危机体验之下的人重新意识到自身的身体性与对身体的仰仗和依赖,如同从语言构筑的理性和真理堡垒中被驱逐出来,意识到人类不可撤销与回避的身体与身体性。人从混沌中走出,从与动物同一的身体性上升到更高级的生存层级——灵魂与精神世界,如今却又重新回到身体性的混沌与挟制中,这就为羞耻的发生提供一个最合理的场域。身体和身体性作为最原初的羞耻对象和羞耻的表达载体,其复归必然会引发羞耻体验的强化与丰富。而真实性危机和自我危机也与羞耻中的关于被削弱的以及被干扰的分裂的自我所生发出的情感体验趋于一致。

与之相应,文学作品中关于“人”和“自然”的话语也呈现出一种明显有异于从前的态势。“生命”取代“自然”,文学引以为对象的“自然”,到了1900年,不如说是“生命”。自席勒以来,对文学皆冠以“自然的储存者”(Bewahrer der Natur)的称谓。然而何为自然,在1900年前后,又有新的理解和阐释。“自然”并非全然理性,也不必承担技术时代所赋予的理性和科学准则。1900年前后的文学主题是自然的人,文学言说的对象——被限定为人的自然和自然的人,人是其中的中心和归宿。

沃尔夫冈·里德尔(Wolfgang Riedel)在对当时的文学进行文学人类学的考察时明确提出,世纪之交的德语

文学经历一个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范式转换”,那时候的文学创作中,“人”的主题几乎就等同于“身体”,尤其是“性”(Riedel 1996: VIII)。自1900年,文学开始倾向于关注人和人的自然性,它不再从“永恒的灵魂”中探寻人类的本质,理性和灵魂流离失所,必须另辟蹊径。“身体”、“性”、“欲望”等都变成新的人类本质栖居之地,这为羞耻进入文学演绎的范畴提供一种新的契机与角度。

2 文学文本对羞耻的显现与演绎

施尼茨勒作为弗洛伊德在文学上的双影人,以用文学创作表现人类心灵世界著称。本文所选的两篇小说《古斯特少尉》(*Leutnant Gustl*)和《埃尔泽小姐》(*Fräulein Else*)都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写就。发表于1900年的《古斯特少尉》是德语文学中的首部纯意识流小说,比英国的《尤利西斯》还要早20年。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采用以主人公本身为基准的第一人称和现在时态,摒弃叙述者的外部视角与时空纬度,代之以主人公的意识流动直接呈现,不假修饰,不经筛选。如此,原先隐匿于语言与理性关照之外的情感与心理便脱去屏障和掩饰,从隐晦走向显现。这样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一方面完美呼应并践行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于1890年发起的“心理艺术”(Nervenkunst)和“新心理学”(Neue Psychologie)文学方案,将文学关注的重心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类精神世界,以“表现灵魂与精神在进入意识和理智领域之前的最原初与粗糙状态”(Bahr 1976: 94);另一方面,也为同时期兴起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提供一种文学上的呼应与解读方案。文学对意识流动的直观呈现类似心理分析中精神分析学家椅子上病人的自由联想,其目的都是找到一种进入被压抑的潜意识层面的通道,揭露深埋于意识中的那些幽暗与无序的片断。

而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表现诉求与表现形态中,羞耻找到其最完美的演示路径。从词源上看,Scham本身就有“掩盖、隐藏”之意。可见,“自我掩盖”与“耻”不可分割。感觉羞耻之人会急于隐藏自己,将自我隐匿于人前。羞耻之人同样无法即刻将感受诉诸语言,而是将之藏于暗处,唯有反思与内省才能追溯其生成与演变。在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被纤毫毕现地还原于纸面,内省、分裂以及由之而生的致命的羞耻才有机会被清晰地呈现。

2.1 《古斯特少尉》

《古斯特少尉》是施尼茨勒的代表作之一,虚伪傲慢的古斯特少尉在剧院的衣帽间被一个地位低贱的面包师斥为无赖,自觉荣誉受损,无颜苟活于世,决斗不成,便要以死保全体面,以维护军官荣誉。而当他于次日黎明得知面包师已于午夜中风身亡时,便如释重负,从羞耻中全身而退。

小说人物和场景的设定皆与时代相符,深深影响当时奥地利社会生活的几个仪式性元素:决斗、军官阶层的荣誉法典、经济优越的先生和甜妞儿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金钱社会中被颠覆的价值观与道德意识等,都有映射且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主人公的羞耻形态。

古斯特的羞耻源于自我的溃散与荣誉的缺失,二者交织,促成其向死的决心。而羞耻的唯一观众以死亡宣告退场则让羞耻得以被全然掩盖,不留痕迹。可见克服羞耻的方式有二,或是主体死亡,或是观众消失。

如题目所彰显的那样,古斯特少尉首先是少尉,其次才是古斯特自身,他的身份认同首先来自外界设定,这正是当时奥匈帝国军官阶层的特性。

他出身不好,因为“中学被赶出之后无奈地进入了军官学校”(韩瑞祥 2011: 133),在军官学校,又因缺钱购买马匹而放弃骑兵团,进入次一等的步兵团。然而,穿上军装,挎上军刀,古斯特就成为一位体面、强人一等的少尉。如何正确并合乎规范地举年投足是他一切行动的准绳和初衷。从他的独白所暴露的性情来看,其内心与灵魂并无德行操守可言。这种冲突势必导致自我与外部设定的分裂与自我的异化和流失。他已习惯用外部准则来打量自己,即使是纯私密的心理独白,也是全程不间断地用外界的目光来反观自己。

低贱的面包师对他的羞辱和挑战让他自觉荣誉受损。“我彻底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我全完了……丧失荣誉就意味着丧失一切!”(同上: 140)他庆幸四下无人见证,不然自己定会“立马拿枪自杀”(同上: 136)。他又觉得事情必然会被声张出去,羞辱势必演变成一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丑闻。之后,古斯特的意识流动越来越快而无序,如同让人眩晕的梦境。只是此处的“意识”并非逻辑严密的理性意识,而是未经理性与逻辑加工的意识碎片和片断。因此,在被诉诸语言时,显得支离破碎,语无伦次,并非与理性思维同构的具有严整语法结构的语言,类似潜意识或前意识冲破意识关卡化作的呓语。

正因为军官荣誉由他人设定也依赖于他人的认可,是一种象征性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因此,当荣誉受损时,他也只能求助于符号系统中的方案,如决斗、自杀。决斗之路行不通,因其只能发生在贵族、军官、学者之间,手工业者和小工商业者并无决斗资格。那么,化解丑闻唯一的途径只剩下逃亡或死亡。

虽然他一再强调,向死的心是因为无颜面苟活,即使无人知晓,“像我这等人,哪怕是在没有人的场合受到侮辱,也会变成一具死尸”(韩瑞祥 2011: 148),但他不间断的意识和听闻面包师猝死之后的本能反应都向我们提示了其生死荣辱全由外界决定,而非本心。“他死了——他死了!没有人知道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同上: 155)。观众消失,耻就消失,一切如同从未发生,外部不留痕迹,

内心亦再无波澜,无须再去求死。这也印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耻与罪的区分(本尼迪克特 2013: 176 - 205):在耻感文化占主导的社会里,耻感由外来的批评或揭露引发。传统与习俗是人们行为的主要参照,社会则承担监管和控制的义务和功能,致力于社会中的人言行合理一致。人们因为害怕触犯社会权威而被迫约束自己的行为,当个人的行为受到社会或者他人的批评不被认可时,人们会觉得羞耻、丢脸,从而采取仪式化的和形式上的弥补措施,以挽回颜面,修复社会或者他人对自我的评价。犯了错的人,只要其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无须懊丧。

2.2 《埃尔泽小姐》

时隔二十余载,施尼茨勒发表第二篇纯意识流小说《埃尔泽小姐》,全篇呓语般喃喃的心理独白赋予主人公无声表达的可能性,让其无法诉诸语言的和心理和情感得以铺陈开来。情感和意识是语言表现的对象,外界人物与事件都以其在主角心理的投影被展现,无所谓真实与否。其中,羞耻仍是不容忽视的主题。

19岁的市民少女埃尔泽为父债所累,不得不在度假途中向同行的商人道斯戴借一笔巨款,以助父亲偿还债务免除牢狱之灾。后者同意了埃尔泽的请求,但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欣赏其裸露的身体,埃尔泽因此陷入巨大的羞耻与矛盾之中。最后,她身裹黑色大衣,在酒店的音乐沙龙里当着众人的面褪去衣物,将自己赤裸地置于所有人的目光之下,随之陷入昏厥,并最终在深重的耻辱中服下事先备好的毒药,香消玉殒。

在《埃尔泽小姐》中,主人公的羞耻感主要表现在其作为市民少女身体性的存在和与之相关的被极端物化的处境。故事的矛盾冲突因钱而生——债台高筑的父亲敦促19岁的女儿去为自己筹钱,这反映战争后通货膨胀下的奥地利市民对金钱穷途末路式的向往与追逐。婚姻与爱情沦为买卖,埃尔泽不得不附着于这样的金钱社会,并认可其中的游戏规则:

“这世上的一切都有其价值。谁要是本可得到报酬却白白抛掷掉资本,那可就是傻子了”(韩瑞祥 2011: 35);“我美丽的双肩和漂亮细长的大腿是干什么用的呢?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呢?他们,他们所有都对极了。他们把我教育成这样,无非就是为了让我出卖自己,那样卖法”(韩瑞祥 2011: 46)。

当商人道斯戴提出用观看埃尔泽的身体来交换5万古尔登时,身体被彻底物化,成为可售的商品。这也让埃尔泽对自己极端物化的处境有更清醒的认知:“一种耻辱,这种生活。我不能让人这样对待我。爸爸是要我死啊。我这也是自己找死啊”(韩瑞祥 2011: 32)。如果原先对婚姻可售性的设想还带有某种自主性的憧憬,那么,这一桩以赤裸换取金钱的交易让埃尔泽看清自己毫无自

主的纯身体性的存在,而这身体上还被标明价码。

故事的场景被安排在一个奢侈的度假旅馆,旅馆是介于家(私密性)与社会(公众性)之间的场所,所以,主人公总是在个体性的自我与社会性的自我之间来回穿梭。当她走出自己的房间进入公共活动空间时,她便进入一个开放的、目光交汇的网络中。埃尔泽在与他人面对时,总能第一时间感受到他人的目光(尤其男性)与注视,欲望通过目光直接抛掷到她的身体上,她对承载欲望的目光有知觉,并逐渐将之内化。注视的魔力在于:通过目光,被注视的人的特征被注视者侵占:目光隐含身份认同。我通过目光为你划定角色,我用目光书写我对你的认知。当被注视者接收到注视的信号和目光所传递的信息并认同时,其部分自我就被侵蚀转换掉。

埃尔泽将男人的目光内化进自我观察的机制中,即使私下一人,也将自己的身体想象为男性欲望的载体和对象。她一面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美貌,一面私下模拟男性的目光打量自己,因而无时无刻不处于被注视的状态——被他人注视,被代表他人目光的自我注视。她被迫沦为身体性的存在,也认同这种被目光和注视赋予的身体性价值。而道斯戴提出的观看要求将他人的目光提升为一种强权,身体的展示由主动转向被动。

受害者害怕被注视,被他人的目光侵犯,因此会尝试抵抗。因为当她被强行要求剥去衣物,毫无遮挡地暴露于目光之下时,她便被剥夺最后一丝遮蔽。如萨特在分析目光与注视时所言,赤裸的身体在这里象征其无遮无掩的对象性。穿衣本是为掩盖其对象性,是要求不被看见的权利,是对绝对客体化的拒斥与抵抗。褪去衣物的裸体被他人注视正是原始羞耻极端化的体现(萨特 1987: 361)。

我羞耻意味着:我不想被看见。羞耻不仅导向自我遮蔽,还让人拒绝注视“这是一种有魔力的姿态,它源于这样一种信念:什么都看不见也就不会被什么看见”。因此,当她将包裹在大衣里的身体赤裸地呈现于全场人的目光下时,巨大的羞耻感让她有意地陷入昏聩当中——她闭上眼睛,也关闭与一切目光接触的可能性,羞耻的自我便从目光中隐匿。虽然看不见,却能听见。可见昏迷是有意的,是一种为逃避羞耻而突然生效的心理防御机制。昏厥之后的埃尔泽其意识仍在一刻不停地流动。

“我闭起眼睛,没有人能看得到我”……“我昏迷不醒地躺在这儿,闭起双眼,你们再不会看到我的眼睛。”……“我昏厥过去了,我必须沉默”(韩瑞祥 2011: 71)。

直到这一伎俩被旁观的茜希一语道破:“您只穿了一件大衣就进了音乐室,突然就赤身裸体地站于众人眼前,

接着您就昏了过去……可我压根儿不信,我不信您失去了知觉。我敢打赌,我讲的每一个字儿您都听得清清楚楚”(韩瑞祥 2011: 76)。

旁观者用言语再现羞耻的场景,将埃尔泽无意识的羞耻重新抛到语言所建构的意识层面上,同时,戳破羞耻的面纱,将埃尔泽从单方面构筑的“不看-不被看”状态中裹挟而出,重新进入观众的目光中,羞耻无从遁形,只能以死克服。

埃尔泽的身体是羞耻的对象,同时也是羞耻的承载者和表达媒介。正如达尔文在分析羞耻的生理反应时总结的那样,一个受羞耻感困扰的人往往会出现心跳加速、呼吸不畅、手足无措、语无伦次甚至失语的症状。感觉越是敏锐,这种精神受困扰的情形也就越严重(达尔文 2009: 213)。

3 结束语

本文所选的两篇小说展现出人物的羞耻各有异同,从羞耻的根本生成条件上看,均可归于主体分裂与在他者目光注视下的主体对象化,但因二人性别和社会地位的差异,羞耻的形态和诱因却不尽相同。从根本结构上来讲,羞耻是人类生存方式中的常量。但若从形态和具体诱因看,却又是文化和历史的建构物。

参考文献

- 查尔斯·达尔文. 人类与动物的表情[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韩瑞祥. 施尼茨勒读本[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让·保罗·萨特. 存在与虚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 Bahr, H. Die neue Psychologie(1890) [A]. In: Gotthart, W. (Ed.), *Das Junge Wien: Österreichische Literatur und Kunstkritik 1887 - 1902* [C]. Tübingen: Niemeyer, 1976.
- Demmerling, C., Landweer, H. *Philosophie der Gefühle: Von Achtung bis Zorn* [M]. Stuttgart: Verlag J. B., 2007.
- Riedel, W. *Homo Natura: Literarische Anthropologie um 1900*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6.
- Scheler, M. *Schriften aus dem Nachlass. Band 1: Zur Ethik und Erkenntnislehre* [M]. Bonn: Bouvier, 2000.